

女性單親家長教育投資：經驗與效益

許雅惠

前言

做為多元家庭型態之一，以女性為戶長的單親家戶一直是福利政策焦點議題。從早期Diana Pearce（1978）所提出的「貧窮女性化」概念、Jane Millar關注英國單親母親的經濟處境（Millar, 1989）、因單親所導致之嚴重兒童貧窮問題（Millar & Ridge, 2009; 2017; 2018）、不同福利體制對女性有極多不公平的假設而導致女性貧窮（Lewis, 1992）等。曾經，單親女性家庭在1980年代後的新右派福利政治中，被標籤為「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被指為「福利依賴者」，成為眾矢之的。1990年代後的第三條路、工作福利、社會投資策略等福利路線，更直接要求單親家長必須進入職場工作，重新接受教育和訓練，以求能在職業市場中自食其力。美國、英國、澳洲、法國、德國，即便是就業率高的北歐國家等，都開始以「激活就業政策」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來回應全球化的國際競爭。縮減福利、強化投資——單親家庭都站在最前線，也最脆弱。

從1996年美國的福利改革到2017年英國的單一福利金改革，我們都看到單親家庭及其子女，特別是女性單親，在工作與家庭的選擇之間被擠壓著。然而，單親家長在就業市場中有何選擇？不甘願地把孩子送去托育中心，然後投入低薪、長工時的工作？從充權、培力的角度，什麼是有效的策略？

本文將從社會投資和教育投資的角度，介紹國內目前唯一的單親家長培力方案內涵與成果，並以計畫參與者的訪談資料，描述單親家長的教育投資經驗與效益。

壹、社會投資與教育投資

從1990年代開始，著重於「訓練、教

育、就業與家庭平衡、提升就業能力」的社會投資政策，已然成為歐盟國家面對這些挑戰的主要方法（Dräbing, 2013）。

Giddens（1998）的第三條路認為，政府應將財政支出投資於人力資本是一種正向積極的福利，而民眾也應該是個冒險家。Giddens指出，終身教育以及政府扮演促進社會經濟的角色是引導社會投資最重要的策略。Midgley & Sherraden（2000）主張，社會投資和1960年代興起的社會發展概念是一樣的；他們強調投資於「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成本效益計畫、就業、個人與社區資產、去除經濟參與障礙」，就是一種社會投資取向。Esping-Andersen（1992）在分析福利體制時，認為瑞典的生產性或預防性社會政策強調投資於成人的訓練與教育、就業、工作流動與家庭服務以擴大經濟參與，這也是一種社會投資策略。

歐盟於2013年提出「社會投資套裝」概念，倡議未來取向的福利政策，藉由從兒童時期投資人力資本，好讓個人與家庭「準備」（prepare）回應充滿競爭知識社會之社會新風險，而不是在遭遇經濟不幸之後才來「修補」（repair）不幸事件（Hemerijck, 2016）。社會正義仍是社會投資觀點所關切的，但是實踐社會正義不是透過所得重分配，而是以教育與就業，作為打擊貧窮與社會排除的主要策略，促使人們重新回歸到勞動力市場

（Dobrowolsky, 2002）。歐盟國家的社會投資訴求擴大投資於「人」（investment in people），將重點置於教育及人力資本的發展、促進終身學習、強化兒童早期介入、鼓勵積極參與勞動力市場等社會政策（Jenson & Saint-Martin, 2003）。

社會投資以知識經濟為基礎，其觀點強調應用多種政策工具，以提升人力資本，並促進人們的知識和技能，使之獲得能力、參與社會和經濟生活（Natali, Vanhercke & Johnson, 2015）。自從2000年的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歐盟越來越重視教育與訓練政策（ET, education and training），這是歐洲知識經濟模式的主要成分，強調教育與訓練是人力資本的投資策略，是強化競爭力與促進經濟發展的生產性因素（Agostini & Natali, 2015）。

社會投資強調經濟成長與就業促進的整合模式，策略上著重於活化勞動市場與人力資本投資以解決失業問題，減少傳統消費性的福利支出。因此，強化人力資本與勞動市場參與的政策，成為最主要的工具（Ahn & Kim, 2015）。

女性單親因為有子女照顧負擔，故於求職、升遷、穩定就業上，較易遭遇困難；工作時間、地點、配合雇主要求加班等阻礙較多。若人力資本（學歷、技能、證照與就業經歷等）偏低或不足，則就業的選擇更加受限。從就業獲得經濟資源，

是現代資本主義體制下多數人的生存方式。無法就業或低薪工作者，將會有很高的貧窮風險。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女性單親若屬教育程度低、缺乏工作經驗、工作能力不足、工作報酬偏低者，則可能選擇不就業以照顧子女。長久下來，即便福利制度可以短期救急，但也可能陷之於長期的貧窮與依賴。

若單親家庭陷於經濟困境，除了社會救助制度可「救急」之外，教育才是「救窮」的最有效策略，但也不能完全將脫貧責任寄託於一、二十年之後的弱勢單親家庭子女，或許國家政策可試圖透過教育投資，在較短期內協助單親家庭取得向上流動的資本。

研究指出，完成高等教育是經濟弱勢的女性單親家長脫離貧窮最有效的方法（Dodson & Deprez, 2019; Haleman, 2004; Institute of Women's Policy Research, 2018; Tiarniyu and Mitchell, 2001）。終身學習的策略也被用來強化人的適應能力與彈性，使人能持續參與經濟活動及社會融合。除了經濟支持之外，政府在打擊社會排除所要扮演的角色是擴大就業與教育機會（Perkins, Nelms & Smyth, 2004）。以美國阿肯色州華盛頓郡的單親培力獎學金為例，該單親獎學金方案每年能申請三次，提供給就讀大學有需要的單親。接受獎學金的單親完成學業後有許多改變，包括提升自我形象與自信力，以及提升就業

競爭力（翁毓秀，2009）。

早期鄭麗珍（1999）曾研究臺北市女性單親家庭的資產累積及兩代傳遞過程發現，女性單親的教育成就和父母親那一代的教育程度相當類似，特別是低收入戶組的女性單親家長因為長期教育投資不足，難以脫離經濟困境。趙善如（2006）研究高雄市單親家庭生活品質也指出，最大資源因子是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其次才是經濟性資本和家庭關係等。

從性別角度看，女性通常較難獲得原生家庭的教育資源投資；特別是單親女性，如果曾因未婚生育或早婚生育而中斷教育學習。如欲持續接受教育，將會可能需要使用助學貸款。以卜少平、駱明慶（2015）研究發現來看，父母親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是有性別差異的；控制了所得、父母親教育程度以及其他變項後，女性仍有較高的就學貸款比例。而且就學貸款的性別差異只存在於家中有不同性別子女的家庭，顯示就學貸款的性別差異是父母親的選擇結果。陳品守（2011）指出，女性在學期間，若有使用就學貸款者，隨著就學貸款金額的增加，畢業時將愈傾向於工作，並且降低升學意願，顯示就學貸款將影響學生畢業後生涯規劃的抉擇。

當家庭無法提供平等資源給女性接受教育時，或當女性因婚姻或生育而必須中斷學業時，一旦成為單親家長，立刻會面臨人力資本不足的問題。因此，教育投

資確實是關鍵的培力策略。黃明玉、吳惠如、郭俊巖（2014）認為，我國扶助貧窮的女性戶長單親戶的福利措施，雖已從消極的現金救助轉向側重教育、訓練和人力資本培育的資產累積政策，但政府現行的資產累積政策，如臺北市家庭發展帳戶的脫貧方案似乎僅停留在鼓勵受助者努力賺錢儲蓄，以獲致政府相對撥款補助，這類脫貧方案並未顧及女性戶長單親戶陷入貧窮的多重困境，包含人力資本不足、職場競爭力低、資源網絡缺乏、家戶資源匱乏及依賴人口照顧等問題。由是，女性戶長單親戶想藉此方案達至穩定就業或自立生活亦相當困難。

目前，臺灣的低收入與中低收入戶中，有超過30%是單親家庭，而且低收入戶的家計負責人約有92%學歷是高中職以下（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在目前官方統計數字中，我們並不知道全臺灣的大專校院中有多少大學生是單親家長；即使許多大專校院都已經設立校務研究中心（IR, Institutional Research），負責各校的各项業務的統計資料，也已開始關心身心障礙學生、原住民族學生、新住民家庭子女、第一代大學生等數資料的蒐集、但仍很難找到單親家長大學生的數據。我們是否應鼓勵經濟弱勢的家計負責人，進入高等教育成為大學生呢？獲得大學學歷，對單親或弱勢的家計負責人，有甚麼具體的效益？

貳、「單親培力計畫」之教育投資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衛福部社家署）自94年度起實施的單親培力計畫，就政策邏輯與目標來看，或可視為是具有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觀點的政策。該計畫「單親培力計畫」（原為單親婦女培力計畫，自96年度起將對象擴大至單親男性），「鼓勵獨自撫養18歲以下子女的單親父母再度進修就學，提升專業知能，促進就業能力」。該計畫設定以「獨自撫養18歲以下子女的單親父母就讀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費、學雜費與學分費用補助，及於修業年限內因上課無法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女或18歲以下身心障礙子女臨時托育費，並提供單親相關資訊及轉介服務，以協助單親家長增加社會競爭力」（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0）。

自民國99年至今，衛福部社家署均委託該計畫予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權基金會）負責執行，辦理有關資料建檔、審查、補助撥款及相關行政事項。根據該會最新成果報告指出，108年度單親培力計畫之學雜費與臨時托育費申請，共計有150位申請者，核定補助124位，總補助金額2,569,488元整。從民國100年至108年底，總計補助培力單親家長2,955人次（因申請者就讀期

間每年均可申請補助，故以補助人次計算受益狀況）（其中男性單親人次占總數5.5%；女性人次占94.5%）（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2020）。

然而，該計畫於民國100年之「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補助」申請案件為803件，通過649件，補助金額為6,037,020元；但近幾年的申請人數與金額卻明顯逐年下降。以108年為例，全年度僅剩150人申請，124人通過，通過比率為82.67%，補助金額減少至1,186,505元。如圖1所示（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民109），呈現逐年下降趨勢。累計來說，單親家長申請就讀之教育機構，95%為大學（專）校，約5%為高中（職）校。（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2020）。

單親培力計畫除了支持單親家長重返校園就讀，也考慮到其未成年子女的照顧問題，故亦提供子女臨時托育費的補助，可惜這項服務的使用申請者更少。以108年度來說，共42人申請，39人通過，通過率92.9%，補助金額為1,382,938元；整體補助金額有逐年小幅增加。依該會統計，自100年度起至105年度止之申請臨時托育案件數及補助款金額，呈現逐年遞減趨勢，但106年後又逐年增加，詳如表1（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民109）。上述申請者的社會人口分析顯示，不管是高中組或大專組，女性單親家長均占比90%以上；性別比例歷年來無甚大變化。

檢視100年至108年申請者所填列的單親成因則發現，離婚皆為單親的主要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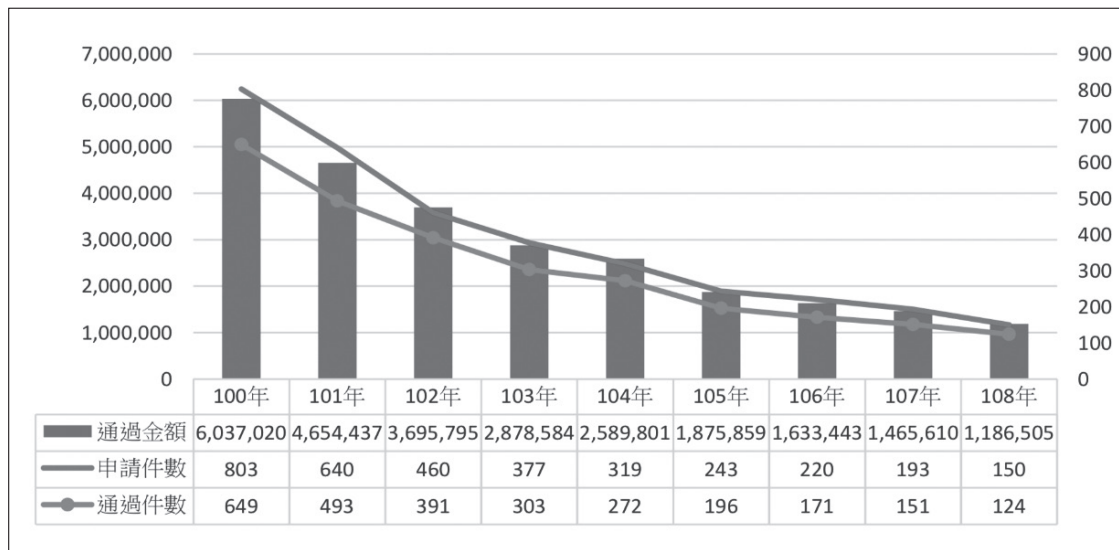


圖 1 100-108 年單親家長學雜費補助申請狀況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108年單親培力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原因，總計1,856件，其次是未婚生子，總計409件，喪偶則位居第三，總計186件。歷年整體趨勢不變（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2020），參閱圖2。

年齡方面，以100年至109年總培力人次的年齡分佈來看，歷年申請者年齡

以31-40歲者占比率最高，總計1,516人次（約51.3%）；其次為41-50歲，總計812人次（約27.5%）；再其次是21至30歲組，有491人次（約16.6%）。扶養子女數歷年來皆以扶養「1名」子女為最多，計1,939人次，占比65.6%。其次為扶養

表1 100年至105年度臨時托育補助概況

臨時托育費補助情形歷年分析									
年度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通過金額	2,481,602	2,294,172	1,716,955	799,275	702,660	715,860	958,162	1,273,600	1,382,983
申請件數	123	120	87	50	35	34	37	42	42
通過件數	112	109	86	36	32	25	33	40	39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108年單親培力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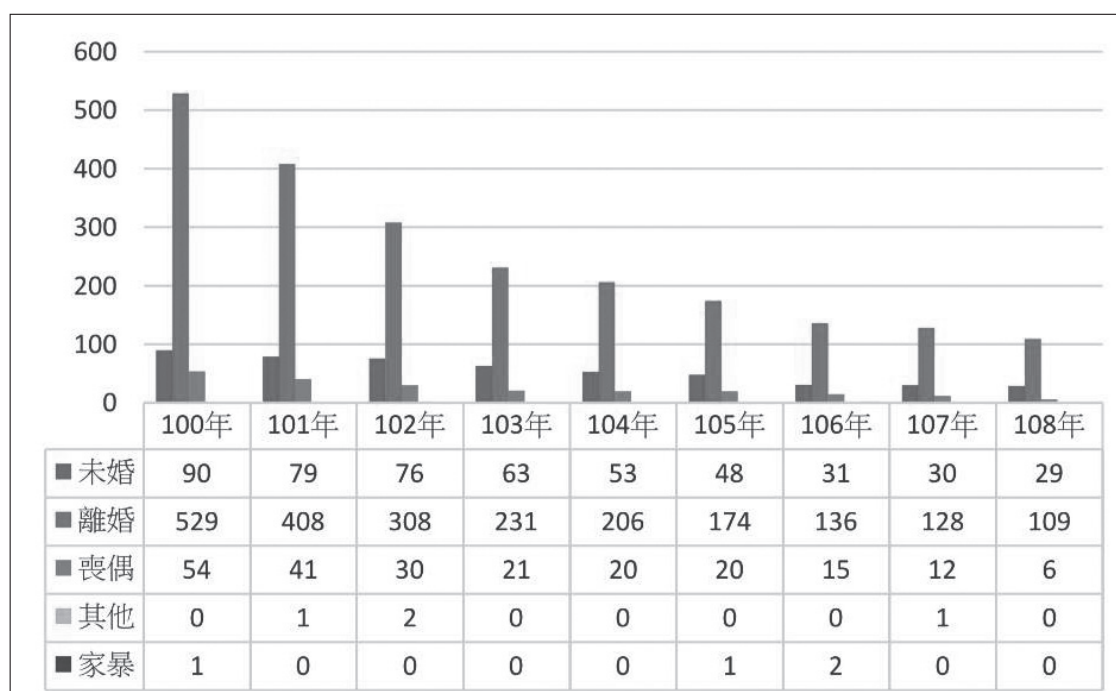


圖2 100年至108年度申請者成為單親原因分析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105年單親培力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2名」，計864人次（29.2%）。撫養3名子女以上者相對較少；歷年趨勢大致如此（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2020）。

另有關申請者的居住縣市，人數最多的前3名皆為直轄市，代表受補助之單親培力家長多以都會區為主；申請就讀學校較高比率為私立學校。歷年來曾經調查單親家長繼續就學之動機皆以自我成長學習、提升教育程度及增加競爭力占最高比率之前三名。選擇就讀科系的分析也顯示出男性與女性在選擇就讀動機上無太大差異，男性與女性皆以學校上課時間可配合為優先考量。多數申請者修習學位的時間以假日班為最多，占40%，其次為周一至周五夜間，占31%；選擇日間學習或函授課程者比例甚低，且性別上無太大差異（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2020）。

另根據婦權基金會各年度調查資料顯示，108年度單親培力家長有87%於就學期間同時有工作，其中約五成（57.6%）家長屬於全職工作者。無論男性或女性，均以全職工作為多數。另，有關申請動機，申請者期待就學畢業後對自己的幫助，「以提升專業知能」及「獲得更好工作機會」為最多，其次為「收入增加」。其中女性以獲得更好工作機會為最多，其次為提升專業知能和增加收入（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2020）。顯示申請者認為重返校園、提高教育程度可以提升其人力資本與經濟資本。

參、研究過程與受訪對象說明

研究者於106年間，透過婦權基金會代為邀請並獲得受訪者同意，邀請20位接受上述單親教育補助費用的單親家長，進行面對面的深度訪談。立意選樣標準設定為100年至105年間，連續申請補助、持續就學至少四個學期、居住不同區域、不同年齡層、不同單親原因之家長（男性2位，女性18位），以平衡資訊豐富度與背景差異性。

每位訪談時間約1.5-2.5小時，約訪地點多數以受訪者住家附近的咖啡廳為主，共有14位於咖啡館內進行訪談，另外其他受訪者則是以社區服務協會1位、某家防中心1位、婦幼館2位、自家店面2位；訪談完畢時，感謝受訪者並給予受訪者訪談酬勞費用1000元，另計補貼車費用後完成訪談。限於本文篇幅，以下略為說明受訪者背景。相關訪談程序操作與研究倫理規範等，均依照學術研究倫理原則確實執行，過程中業經專家審議通過，合先敘明。

20位受訪者年齡分布最多人數落在41-50歲之間（9位），最少的落在20歲以下與51歲以上各有1位受訪者，21至30歲之受訪者4位，31-40歲者有5位。11位受訪者育有1名子女，7位育有兩名子女。

受訪者在學歷皆有大專院校之學歷，其中僅有一位受訪者曾申請過兩所不同學

校，最多人申請科系為行銷管理相關科系、社會工作相關學系各3位、其次為醫務管理相關科系、資訊管理系、應用外語系各2位、觀光管理系、科技管理系、幼保系、會計統計系、生活科學系、時尚美妝系、法律學系、國貿系；受訪者當中僅有一位受訪者是在高中職申請過，目前持續申請大專院校學費補助。受訪者之國籍以臺灣籍為主要對象，共計有18位，其他包括大陸籍2位。多數受訪者過去都曾從事過餐飲服務業，計16位曾經擔任過餐飲業的工作人員；洗碗工、烘培師（員）、廚師、廚房管理、遊覽車、餐飲主管、早餐店店員、飯店經理、導遊、冷飲店老闆、飯店服務生、網拍、理貨員、美容師、百貨工讀生、超商店員、彩券行員等。

受訪者目前從事之工作，從事照顧服務有3位，其他為紡織貿易生產管理、社工、打工（洗碗工等）、店長、保險協調者、居家托育保母、稅務會計、補教老師、美妝美髮講師與美髮設計師、旅遊業經理、業務助理、打雜、老闆、貿易行政各1位，另外目前無工作待業中有3位。其他性質之職業包括教師（助理教師、補教老師、美妝美髮講師）3位，助理（業務助理、行政助理、廣告部門助理）3位，行政管理3位、保險員（助理）3位、業務2位、家庭主婦2位，其他為生活管理師、加工區契約工、稅務會計各1位。

受訪者以目前有工作者統計資料顯示，資薪資分布以3至4萬元與5至6萬元各有4位，其他則為2至3萬元3位，4至5萬元2位，6萬元以上1位，而有6位薪資不明。以下分析將主要呈現其中18位女性單親家長於接受教育補助、回到校園學習後的經驗與影響。男性受訪者資料不納入分析。

肆、跨越求職門票：人力資本與經濟資本提升

回到學校完成大學教育，不僅是取得履歷表上的學歷；更重要的是可從中獲得專業的知識，認識更多老師與同學，帶给孩子正面的影響，甚至有些可以直接在薪資上獲得立即的提升。其中，年齡是否具有優勢、是否因教育而取得特定技能，是特別關鍵的差異點。

以中高齡者來說，完成大學教育可能是彌補年輕失學的遺憾，也可能是一種實現自我的管道；學歷取得對具體的收入增加、提升就業效益並不明顯。他們也未必會選擇與目前就業職場相應的科系；因完成學業而轉換職場的期待較低。他們對於以投資教育來跟年輕人競爭，心態上比較消極；頂多是期待進修之後所學習到的技能，將來可以用為副業、兼職之用。

經濟上具體其實我並沒什麼很明顯的感受到，可是你說找工作，找工作就像我

講的，至少我現在找工作的時候我可以直接跳過大學畢業這個門檻……對，產業沒換，然後職務也沒換，就是單純換公司這樣子。（A-027-033）

受訪的單親家長對於提高學歷是否能立即幫助經濟收入或生涯發展，其實看法不太一致；主要是因為影響職涯發展的因素很多，現有工作職位、求職者年齡、產業機會、居住區域等都是要考慮的因素；即便所選擇的科系是以職業為導向，也未必會立即改變就業選擇；有可能是為第二專長或將來轉換工作做準備。

年齡較大的受訪者，也會擔心自己所學科系、電腦技能或年齡偏高，而在轉換職涯過程中被歧視。整體來說，較難立即看到教育投資對就業職涯的影響。特別是選擇空中大學或因早年失學而回去圓夢的受訪者，多數滿意於他們目前的職業，並未有明確的轉職規劃。以50多歲剛念完法律系的B來說，她明白自己的優勢與劣勢，對於要和年輕人競爭也感覺有壓力，但她非常肯定自己念法律希望伸張正義的初衷；C則想著或許以後有機會發展副業；R則認為很多同學都是著眼於薪資可以獲得學歷加給而選擇再進修，顯然學歷對工作所得確實有所助益；雖然她自己並未從中感受到很具體的幫助，因為她的年齡確實偏大。

對，某些技能是不ok的，我會法律可是我就是不會電腦，律師事務所我們老師就推薦我去……但是年齡的差距和專業特殊的能力，人家要選年輕的，因為他們很會打電腦，他們沒事就是在電腦上面……office系統、excel上面打字。因為他們要的只是一個助理，可以跑腿、年紀輕一點、會打電腦的。我有跟我們老師談過，我說：現在的法律事務所根本都欠業績，我很好一個業務人才，我口才很好，我會幫他on住他的客人、所有來的客戶。（B-054-057）

研究者發現，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因職涯發展所需而去進修特定科系，期望能對職涯發展和經濟報酬有所效益。以目前34歲的D為例，她在一個地區性小型非營利組織工作，從廚房管理、變成採購人員，會計行政人員，後又接受居家照顧訓練成為老人關懷的居服人員。但她發現到在政府長期照顧服務擴張後，社工人力才能獲得政府的薪資補助；此外，她也發現自己在與老人的互動上有些優勢，於是她決定再去夜間進修社會工作學歷，為自己將來的職涯升遷再累積能量。

類似的案例還有從餐飲業因健康問題而中年轉職的O（42歲媽媽），他們都是有計畫性的選擇所唸科系，期待未來可以在職場上加分。

……我並不永遠都要做居服員，因為我也是為了要做居服督導跟照專，我必須要有這張學歷。……對，我都是想好才知道說我一定要拿到這張畢業證書。（O-125）

由於多數在職受訪者都是選讀空中大學、夜間或假日的進修部，所以他們對於課堂上的知識傳遞和師生互動著墨較少；多數人比較具體提及的，反倒是一些在課堂過程中所學習到的知能，例如蒐集資料、作簡報、學電腦、文書能力增強、創新思考、溝通能力等。偏年長的單親家長表示，回到校園讀書，雖然一開始可能遭遇困難，用電腦、閱讀、書寫報告、製作簡報都讓人挫折；但再度進修讓自己跳脫平常的生活框架，學習會玩、會說話、處理各種人的問題，都是意料外的回報。

39歲來自河南的H則提到她最大的收穫是練習溝通表達，從開始時沒有自信坐在角落，逐步被訓練到可以勇敢應對。研究者認為，以H目前轉職到保險（代辦）服務者的表現來看，嫁來臺灣後因丈夫工作不穩定、酗酒、打罵；婆家不同意外出工作、加上法令限制和本地雇主歧視，後來決定自己租店面開設小型冷飲店，一路咬牙苦撐。期間除了要面對自己的憂鬱症、孩子照顧和攤位生意外，還遭到區公所人員以開設店面為由，申請福利補助遭拒。當時的她的確心灰意冷、健康、經

濟、照顧壓力三者齊至，多次想要自殺。從99年開始進修空中大學課程到去年畢業，多年來的教育投資，不僅讓她獲得許多自信，更重要的是，她說，這是讓她留在臺灣最重要的理由，「其實我讀書在臺灣的生存，在臺灣這幾年如果不是因為讀書，臺灣我一點都不想待下去。」（H-114）。

對，因為我覺得就是抱著學習的心態，就是一開始就躲在角落裡不敢坐在前面，因為老師會抽啊，會幹嘛，就很沒自信，就坐在很角落，後來就坐在中間，因為看的字啊，看老師比較清楚，可能到畢業的最後一、兩年，可能會坐到前兩排，為什麼，因為可以回答老師的問題了，一開始是沒自信，坐在最偏，我一開始有修過大傳系的，可是那個老師XXX，就會覺得說，他的是大傳，就本身就要講話，就要練習你的口才，他就會抽人，有時候點到你，後來話筒就給你，可是拿起話筒就投會一片空白，不敢講話。……有了自信，有了自信有自己的想法的時候就可以講啊。（H-091-92）

就職涯發展方面，研究者請受訪者分享重回校園這件事，對自己的生涯發展有無關鍵影響？大致上可以得到兩種回答，一種是對職業生涯有明顯助益（包括薪資提升、職位提升）；另一種則是對未來

人生的志業轉向，有明顯助益。以前述提及的J（稅務會計）、L（美容講師）、Q（貿易行政）、M（旅行社經理）等，都是直接在職涯上有具體經濟收益上升的案例。

因為之前就是專科畢業他可能只能在小型的事務所，那小型的事務所，其實它的薪資就是很一般，它可能就是3萬、3萬多塊，那自從我就是有了學士學位之後，然後跳到大型的事務所，其實他的起薪就已經比我在那邊九年的資歷薪水還要高，然後再經過這兩年，然後就是其實每年都有再升級一點、升級一點，好像其實差了1萬至1萬5000。（J-019）

薪水一定有增加……因為像我現在又回業界去上班，在跟客人之間的交談，你可以用非常專業的東西去說服客人，譬如說告訴客人頭皮隔離的重要，然後告訴他們一些譬如說皮膚生理學的一些東西…對，那當然，我的業績就會相對比一般的同事高，這是一定的。（L-025-026）

有啊，有了這個學歷之後我就可以去上經理人，然後我就可以成立旅行社，所以我們現在有成立旅行社……（報酬）至少三倍以上。原本3萬，如果現在這樣子來做的話，就會有九到十萬，一個月。（M-111、M-158）

例如中年轉職的Q也認為，回去進修、成績不錯，到了快畢業時，確實對自己的職涯轉換有明顯的鼓勵與加分作用。因為有獎狀、有自信提升，自己也勇敢地提出加薪的要求。因此，從畢業後，她陸續轉換了貿易公司，規模從小到中型，越來越有制度，薪資也有成長。

後來我去……後來我離開這家公司是因為也不想一直做總務，後來就直接跳貿易公司。然後去貿易公司我也是，那時候還沒畢業啊，那時候快要畢業，剩下幾個月畢業，然後去的時候，就是老闆這樣子，然後去就大概講一下，拿了一張獎狀給他看，然後他就說明天來上班。（Q-069-071）

已經從某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科系畢業的A指出，雖然她因為擔心轉換職涯會讓自己已累積的行業優勢歸零，所以沒有因為教育投資而變換工作；但是她認為教育投資是會對職涯產生影響，特別是讀書之後會如果讀出興趣來，將來就會有不同的選擇。

是不一樣的，這還是會有影響的。那是因為我有卡在說我也有曾經想過要換到行銷，有關行銷的工作，那可是因為我的年紀跟我的資歷，我再重新回到行銷工作我是歸零的，那我的薪水可能沒

有辦法負荷、負擔我的生活一切開銷。所以我還是必須得維持在我原本的產業走下去，可是不能說沒有興趣，因為讀了書之後有興趣了，對，在這方面有興趣。（A-162）

對於還在進修中的受訪者，如K（補教老師）、D（照服員）、O（居服員）等，都屬於中年轉業的案例。對她們來說，再進修提供一扇新的窗，讓他們可以在中年之後，重新認識自己、選擇生活方式，並看見自己的未來；他們對未來是充滿期待的。

以K為例，因為就讀空中大學，特別有興趣於心理學類科的知識，K認為持續進修可以提升她的工作知能，累積她更多的人力資本。以她目前在安親補教業的工作來說，她可以將所學知識運用在對兒童少年的服務上，即便「不敢講專業，就是說會覺得會更補足到我自己的不足，而我看的面向又不是單一，會比較廣」（K-047）。

是蠻希望的（笑聲），可是我因為換了工作……有，薪水有稍微提高一點點，有提高兩千元，那我覺得蠻開心的。……當時我是有跟主管報備啦，那我也希望能夠有調整，可是目前是還好（笑聲）。當然希望有能夠增加。（所以大學畢業還是重要的？）……當然，就薪資就有差別。

（會差多少？）……我記得好像三、五千喔。（K-048-054）

由於有8位受訪者都還在就學中，他們都有希望畢業後可以轉換工作，取得較好的勞動機會。雖然薪資能否增加、或增加多少雖然未必明確，但大多是正向樂觀看待。也提及，畢業後至少可以不用職場、學校兩邊跑，不用請假唸書，影響加班與全勤等收入。

我是希望增加（薪資），只是說能夠增加多少，我也不能很肯定。增加薪資我不能保證說會有幫助，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可以去大公司，有很完善的福利，就完善的福利很重要，像我們公司的福利沒有很完善。（N-132-133）

對啊，畢業就是趕快先換公司……。（P-071）

大致來說，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同，教育投資確實可以為單親家長帶來厚實人力資本、擴展就業機會、提升經濟所得等正面效益。然因每個人的職場選擇、就業表現，仍會受到性別、年齡、個性、職場資歷等因素所影響，所以每個人的教育投資時間點與後續職涯表現也會有所差異；最終是否能提升經濟所得，也有所差異。兩者之相關性仍有待深入檢證。

伍、非經濟的效益：凝聚式與橋接式社會資本

本研究在概念架構設計上，除了探究教育投資對人力資本改變與經濟所得提升的影響之外，也可能會增加社會資本累積；但這種因人際網絡擴張而產生的資本是屬於那一種？是凝聚性社會資本（bonding capital）？還是橋接式的社會資本（bridging capital）？

一、凝聚性社會資本

研究者發現，每位受訪者幾乎都擁有很強的凝聚性資本，特別是對家中長輩、兄弟姊妹所給予的支持表達強烈感恩；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同，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教育進修幾乎是不可能的選項。來自父母們的協助，最常見的是協助照顧子女，其次是提供免費住宅，再其次是提供部分的經濟支持或就業協助。而多數受訪者都表示，父母對教育的重視與正向支持，認為讀書是必要且重要的，讓他們在教育投資這條路上走得更有信心。

受訪者A分享了自己當初如何年輕叛逆、愛玩、離家、遭遇家暴而離婚的生命史。離婚後她帶著女兒回到娘家居住，因為父母與姊妹的無條件支持，才能讓她還清負債，無後顧之憂地重拾書本，回到夜校就讀。言談中多次哽咽落淚，特別是思念已故的姐姐對她的幫助，她說姐姐是女

兒的第二個媽媽。家人提供的不只是有形的經濟與照顧，更令人受用的是正確的價值觀和親情溫暖。「真的是離婚，或是在外面碰得滿身這樣，撞的滿頭包之後回到家才發現其實家庭是最終的一切。」（A-118），她說：

他們非常支持……我爸爸很希望我們讀書…在家庭上面他們是很希望我回去讀書，所以我回去讀書，他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那時候我姊姊是主因，就是她push我這一切，在我讀書所有的一切。因為其實我女兒所有的費用都是要由她來（負責）……。 （A-089、105、110）

做了十多年的家庭主婦G，因先生罹患癌症且一年多就過世，自己無力經營丈夫所留下的簡餐店，陷入徬徨無助。所幸有娘家父親、妹妹的支持與鼓勵，讓她鼓起勇氣重新唸書。

家裡面就我學歷是最低的。妹妹就會說妳去唸書，然後那時候我就考慮到我跟她說我沒有錢，因為養兩個小孩……事實上我又沒收入，事實上都是我妹在養，我自己也不敢說我要去做什麼。……對！不敢有想法，後來妹妹就說：「妳去唸書。」因為我妹妹結婚，她就說：「妳去唸書，然後我供應妳去讀書。」，那時候也是，我那時候也在想說也許讀書可以

改變現在，要不然我現在這樣子也不是辦法，然後我就接受我妹妹的建議去讀書。（G-042-043）

在新北市從事稅務會計的J、搬回高雄任美容講師的L、擔任旅行社經理的M，都是類似的情況，雖然他們都算是經濟上獨立的未婚單親媽媽，但是他們都選擇與父母比鄰而住，讓父母、姊妹都可以就近幫忙接送小孩、讓自己忙碌工作之餘可以無後顧之憂。重回校園對她們來說，比較沒有壓力，可以在吸收新知之餘，同時取得提升就業所得薪資，又可以同時認識新的同學，讓生活有新的元素。惟獨子女照顧問題，若沒有父母的協助，恐怕就有阻礙。

再如F、E、J、N、T、L這幾位，幾乎都是年輕未婚媽媽，但言談中，多數都是獲得父母接納與支持的；以居住在臺中市的25歲單親媽媽F為例，受訪地點就在市區一間醫療保健用品專賣店中，訪談者抵達後才知道，位在精華地段的專賣店，她就是店長，五歲的小女兒靜靜的在旁玩耍。店面寬敞舒適，全天候有冷氣，七點之後就關門歇業，家人就居住在店面的樓上。因為父母的引導與支持，讓她得以掌店並於夜間繼續就讀健康管理科系。F則是國中畢業時與一位大她10歲的男友開始交往，高三畢業前女兒出生一個月，與前夫婚姻維繫約一年。另有E、T、N、P

這幾位，目前年齡多在20-25歲之間，她們幾乎都是在國三至高中時期成為未婚單親，其目前能繼續完成高中學歷，甚至進入大學就讀，背後都有父母的包容與支持。

二、橋接式社會資本

回到校園，對人際關係有何影響？是否可以拓展社會資本？受訪者對這個議題的回應，大約可以分成兩大類，部分受訪者認為，新的環境、新的同學，當然帶來很多的新鮮感、刺激、生活樂趣，甚至有些可以成為具體的助益。另一類反應則比較保守，認為大家都是夜間或假日進修，來去匆匆，沒有什麼機會和時間可以交際互動，所以在人際與社會關係上沒有太多收穫。特別是唸空中大學的同學們，因為只會認識選同一門課的朋友，沒有班級同學的概念，所以很少有具體的人際關係發展。

以J為例，她認為上課是開心的事，同學們的互相分享，可以開拓自己的視野；她也觀察到其他年齡相近的同學，會自然形成支持小團體，經常性一起親子出遊。A因為年齡較長、又擔任班代表，所以對人際關係比較有感；感覺上婚喪喜慶活動也增多。I則表示如果可以在學校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例如有同樣信仰的團體，則人際關係的拓展會更明顯，將來有考慮一起組成合作團隊。

G分享她與同學們如何分工合作交作業、學電腦；她的小女兒也鼓勵媽媽多交朋友，表示唸書唸得如何倒是其次，讓她在學習中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F也認同自己因為回到校園，會讓生活圈擴大，間接也會讓自己的孩子在社會互動上有更好的表現。K因為認識更多同學，參加社團，讓生活有了不同的介面，感覺心情有比較快樂的。F認為拓展社交網路，無形中「小孩也會跟大家比較熟，就不會怕生，他（孩子）從小就接觸很多人」（F-065）。

小的（女兒）會覺得媽媽去讀書，好啊，她說：「媽媽妳去讀書，妳要有社交圈，以後我跟姐姐都會在外面，妳自己要有自己的朋友，妳去……不用很努力讀書，可是要交很多的朋友。」（G-137）

整體來說，多了同學當朋友，帶給這些單親家長更多情感性、社交性的社會支持；但似乎較少看到具有資源交換、互惠行為的橋接式社會資本。Q談到進修班級同學的人際關係，因為她的筆記做得很好，幾乎都借給全班同學影印，所以有同學負責接送她上下課、有身為「廠長」的同學請她吃飯以交換借閱筆記、有資深社會工作者引導剛入門的她，認識更多社工社福資源；也有大家一起辦信用卡幫助銀行工作同學提升業績。O則表示，僅有週六週日上課的進修班，同學們要感情多好

也不可能，但是還能交上少數一兩個同學，同學間多少會分享一些資訊。

同學會跟你講說，現在可以有什麼福利，或者哪裡有職缺妳要不要來看看，同學會跟妳講。..他就會跟我講一些說，我們可以有什麼資源幫助我自己，然後他還會跟我說，妳可以往哪裡走，所以我會把一些想法跟比較好的一兩個同學說，然後他就會跟我講說：「對，妳可以做……」。（O-209-211）

比較特別是，就讀新住民專班的C，來自中國的H，似乎比較容易在同鄉友人間感受到溫暖、交到朋友。C從南投到雲林去上課，都有同學可以免費接送她；H則是因為勇於主動跟他人互動，而累積了一些社會關係。

那些同學有的可能年齡比你長，因為空大它是一個，不是像我們從小學都是同年齡層，那你們可能有很長的，也有可能說開公司的，當老闆的，也有可能他在科技公司，電腦軟體都很懂的，也有可能它社會經驗很足的，什麼人都有社會人士，可能你如果打開自己，你只是說，只要比你能力強的，只要比你..能教到你的，我都交，在中鋼上班的…我在學校我是時間比較少的，因為要上班、要帶孩子，那我可能一個月去很少……但我抓到幾乎每一

季，每一個地方只要坐在同一個桌上，同學我都會交一個到兩個。……法律的，或者說……或者說有學英文的，有學外語的，或是說大姐，年齡很大的那種社工的，我也有交過社工。（H-084-085）

當然，也有部分受訪者認為假日或夜間讀書，因為互動機會較少，不太能交到深入的好朋友；又或同學們因年齡差距，人生經驗不同，無法深入互動。甚至有些年齡僅大一般同學4、5歲的年輕未婚單親，也認為自己的單親經驗讓同學們看起來「有些幼稚」；互動上沒甚麼意思。P甚至說，同學們會想要把責任都丟給年齡較大的她，「他們都叫我姐姐，然後就擺爛，認為姐姐都會用，就放死，全部都丟給我做，我就會不爽」（P-082-086）。P也說她沒有什麼朋友，因為「我的朋友都是單身，不然就是沒結婚、沒小孩的，去的地方基本上是不一樣的」。再加上出門社交需要花錢，負擔很大。這似乎反映了社會排除觀點所指，經濟弱勢會影響社會關係。

人際互動有辦法轉換成橋接式社會資本嗎？受訪者的回答多數是保守的，僅有少數一兩位單親媽媽認為，重回校園認識的朋友，曾經在後來的生活中，帶來具體的助益。以A的經驗來看，來自各行各業的同學們，經過情感累積，讓她產生信任感，可以將重要的任務或事情託付給他

們處理（此處指的是委託進修班同學協助辦理家人喪儀、辦理保險轉換、請領等事宜）。A雖然是基於信任而託付，比較貼近凝聚性資本的內涵；但也是因為她的進修因緣，讓她有機會擴展人脈，故可視為是橋接式社會資本所帶給她的豐沛資源。

你說職涯是還好，因為畢竟我沒有轉職的需求。……可能我們班有做保險什麼的啊、有做什麼的啊，就變得說在社會上的人際、人脈的部分真的有累積到，像我們那個老大哥、老大姊，他們是做禮儀公司，那個殯葬社。……我就覺得我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把這種事情拜託他們，因為這就是一種信任感嘛，因為在一起讀書的時候大家建立起來的感情是比較不一樣，沒有在社會、在公司上那種功利的感覺，真的是差很多。（A-149-155）

累積的社會資本，是否能轉換成具經濟效益的經濟資本，可能也需要時間；即便是對於自營作業者來說，人脈與信任的積累是長期用心的結果。以開餐廳的S和旅行社M來說，做生意固然要廣結善緣，但同學間互動通常不會太過功利或目的性，或許等到真正有所需時，才會想起某某同學的專長，也未必會特別去研究背景或經營特殊關係。

總結來說，單親家長再進修，對社會資本的影響，較偏向與凝聚性資本有關，

或可以家庭內部社會支持視之，特別是來自父母對子女的支持與協助特別明顯。至於與外部異質團體間的橋接式社會資本累積，似乎沒有太多的作用。特別是與學校正式系統的互動，大多數受訪者都未提到系所行政、授課老師與他們的互動或協助，可能與學制形態有關；空中大學、進修部、夜間部等學習環境與互動形式，似乎較難與學生有深入互動。

陸、隱形的翅膀：找到自己、做子女的榜樣

多數受訪者認為，父母不因年長而自我設限、積極求學、圓夢的行動，將成為子女的正向榜樣；媽媽再去讀書，雖然壓力很大、時間很緊繃，但並不會對親子互動或家庭關係造成困擾，反而更多是帶來正向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親子間互動和子女對媽媽讀書這件事的反應，其實與子女的年齡有關。青春期的子女比較不會有鼓勵性的言語，通常是已經唸了大學的孩子，才會給予媽媽較多正面肯定與支援。多數的受訪家長都認為，大人如果沒有做好榜樣，將來很難說服子女讀書的重要性；所以自己必須想辦法讓自己的學歷，將來不會在孩子面前漏氣。E、L、M、N都有類似的想法。

對啊，所以才更要讀書，不然他以後……媽媽也不讀書啊，為什麼我要讀書？讀書有什麼用，我不希望孩子有這樣子的……。 (E-121)

他們會覺得，我年紀這麼大了，對他們來說年紀這麼大，但是我還是可以利用時間去求新的知識，利用瑣碎的時間去寫作業、利用瑣碎的時間去讀書，所以我覺得是有正面的效果。 (M-069)

假設我今天沒有完成我的學歷，以後他就可以跟我說「啊你自己也沒有大學畢業啊」。……所以以後我要要求他的時候，也會比較好要求，或是我可以以我自身的經驗去跟他講，因為你如果真的沒有去半工半讀，你不知道真的可以多累。然後很多人都覺得夜校很好混，到底哪裡好混？一點都不好混，沒有很好混。 (N-185-186)

C認為自己去唸書，對原本沒有自信、不喜唸書的兒子有個重要影響就是，自己叨唸孩子的時間少了，因為自己必須花時間讀書，讓孩子也有個榜樣。而她就讀大學的女兒，就非常鼓勵媽媽回到學校並給予加油。

……我去讀書後，我自己也是時間比較緊張，那晚上要看看書，玩手機幾乎是有電話才接了，幾乎沒在玩手機，我就坐下來看書，兒子呢？他就自己在房間，

偷看一下媽媽在幹嘛，以前是我去看他在幹嘛，現在變成「媽媽在幹嘛？」看見媽媽在看書，他也回到他們自己房間去看書去了。……他成績爬上去了。（C-154-157）

A的女兒才國一，但因為陪著媽媽去夜間部唸大學，也慢慢對學習有更多興趣。即便是孩子只有7歲的I，也分享她的女兒在耳濡目染下，因為她的幼保背景，讓孩子也接觸到托育這個專業，甚至還比媽媽更有遠見。B認為唸大學讓自己的視野提升，自己不再只是一個會噓寒問暖的媽媽，而是一個上過大學、可以跟孩子討論人生的「學姐」。

可能是因為我上過大學我懂了……我覺得我好像是學姐在帶學妹，這樣子的教育可以讓我跟孩子之間的相處是不一樣的，我不再是問：你吃飽沒？你去幹嘛？（B-142）

他們（子女）也說我讀書之後好像心情變好，而且思想……他們就會覺得說跟別的媽媽比起來，我們的……可能在外邊一直聽別人講，就比較不會那麼保守……。（G-141）

Q很得意地把小女兒的照片拿出來給研究者看，那是一位穿著北一女校服的清秀女孩。她認為自己的提升，確實是會帶

給孩子影響的。Q用充滿驕傲和自信的語調說：「你知道嗎……我覺得其實就是他們眼界……眼界，你會影響他。……會影響孩子啦」。（Q-202）。

柒、結論：治理整合才能提升投資效益

教育投資一直是幫助弱勢族群促進向上社會流動與實踐社會正義的重要策略。如果我們重視平等與社會正義，我們須注意到機會（opportunities）與生活機會（life chance）仍是造成社會繼承（social inheritance）的重要因素。教育與職業的階層化至今仍普遍存在，父母的教育與職業地位仍對子女的認知能力產生重大的影響（Esping-Andersen, 2002）。因此，若能透過對單親家長的教育投資，進而提升其職業地位，不僅有助於提升單親家庭的福祉，更有利於弱勢單親家庭子女的向上社會流動。前述研究資料顯示，衛福部委託婦權基金會執行的單親培力方案具有明確的社會投資價值理念，且對單親家長的人力與社會資本提升，有明顯的效益。雖然近年來申請人數隨著年輕世代的大學教育程度普及而減少，但方案補助內容應可以朝向職能升級、證照補助、或補助進修碩士學歷或補助第二專長發展等方向調整；而適度擴充補助項目與提高補助金額，也可以強化申請意願。

社會投資於人力資本提升上經常被認為有三大功能：creation、mobilization、preservation，而教育培力的部分就是creation。單親家長回到學校唸書會面臨許多挑戰，美國的研究指出大約33.7%的有子女之單親媽媽要花10年才能完成大學學位（Goldrick-Rab & Sorenson, 2010）。這段期間與後續，要如何去運用、活化教育所獲得的人力資本（mobilization）？如何升級、保存人力資本使不被就業市場淘汰（preservation）？這些措施可能涉及不同的政策與部門，也需要有多層次的服務方案讓人們可以使用。總之，社會投資政策需要大量的跨域整合，教育、經濟、勞動、社福－就業機會與產業結構的配合、教育品質與就業訓練的銜接、福利給付與社會保險的轉銜、區域人口與服務供給的對應

等等，都需要強而有力的制度性條件。

以單親培力這個計畫的教育投資效益來說，目前成效偏重社會性的效益；如欲強化後續的經濟性效益，則必須更深入地評估就業政策和照顧政策的投入。同時，在就學機會增多、學歷貶值、學歷不等於就業力的今日，也期待政府能針對單親培力計畫加強宣導、調整並規劃差異化的補助項目（如考照補助、人力加值等）、強化後續職涯輔導與其他支持性措施；並應責成教育機構提升其公共性，以提高教育投資的效益。

（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社會投資、單親培力、教育投資、成效評估

參考文獻

- 卜少平、駱明慶（2015）。〈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的性別差異——以就學貸款為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2）。頁361-393。
- 翁毓秀（2009）。〈另類教育脫貧方案——以阿肯色州華盛頓郡單親獎學金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24。頁133-140。
-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20）。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8年度單親培力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 陳品守（2011）。《台灣大學生就學貸款的使用與其生涯規劃之關係——以女性為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碩士論文。
- 黃明玉、吳惠如、郭俊巖（2014）。〈從臺北市家庭發展帳戶方案探析女性戶長單親戶脫貧的可能〉，《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4（1）。頁131-152。

- 趙善如（2016）。〈家庭資源對單親家庭生活品質影響之探究：以高雄市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13。頁109-171。
- 鄭麗珍（1999）。〈女性單親家庭的資產累積與世代傳遞過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1。頁111-147。
- Agostini, C. & Natali, D. (2015). 'The EU's Ambivalent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ies' In Natale, D. & Vanhercke, B. eds.. *Soci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State of Play*. pp. 153-182. Brussels: Europe Trade Union Institute.
- Ahn, S. H. & Kim, S. W. (2015). Social Investment, Social Service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Welfare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Welfare*, 24, 109-119.
- Cruse, L.R., Gault, B., Suh, J. Y. & DeMario, M. A. (2018). Time Demands Of Single Mother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ole Of Child Care in Their Postsecondary Success,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Studies.
- Dobrowolsky, A. (2002). Rhetoric versus Reality: The Figure of the Child and New Labour's Strategic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69, 43-73.
- Dodson, L. & Deprez, S. (2019). Keeping Us in Our Place: Low-Income Moms Barred From College Success, *Contexts*, 18(1): 36-41. <https://doi.org/10.1177/1536504219830675>
- Dräbing, V. (2013). Welfare Transformation and Work and Family Reconciliation: What Role for Social Investment i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NEUJOBS Policy Brief* No. D5.6.
- Esping-Andersen, G. (2002). A Child-Centred Social Investment Strategy. In Esping-Andersen, G., Gallie, D., Hemerijck, A., Myles, J. eds..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 -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 Goldrick-Rab, S. & Sorenson, K. (2010). Unmarried Parents in College.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0(2), 179-203. doi:10.1353/foc.2010.0000.
- Haleman, D. L. (2004). Great Expectations: Single Mothe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7(6), 769-784.
- Hemerijck, A. (2016). Making Social Investment Happen for the Eurozone, *Intereconomics*, 51, 341-347. <https://doi.org/10.1007/s10272-016-0632-9>.
- Jenson, J. & Saint-Martin, D. (2003). New Routes to Social Cohesion? Citizenship and 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8(1), 77-99.
- Lewis, J. (2002). Gender and Welfare State Change. *European Societies*, 4 (4), 331-357.
- Midgley, J., Sherraden, M. (2000).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n Social Policy. In Midgley, J., Tracy, M. B., Livermore, M.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olicy*, pp. 435-446.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illar, J. & Ridge, T. (2009). Relationships of Care: Working Lone Mothers, Their Children and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8(1), 103-121.
- Millar, J. (1989). *Poverty and the Lone-Parent Family: The Challenge to Social Policy*. Michigan: Avebury.
- Millar, J. & Ridge, T. (2018). The Family Work Project: Earning and Caring in Low-Income Household, <http://www.bath.ac.uk/ipr/policy-briefs/working-lone-mother-families-and-theirchildren.html>.
- Millar, J., & Ridge, T. (2017). *Work and Relationships over Time in Lone-mother Families*. York, U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 Mojisola Tiamiyu, M. & Mitchell, S. (2001). Welfare Reform: Can Higher Education Reduce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The Urban Review. *Human Sciences Press, Inc*, 33(1), 47-56.
- Natali, D., Vanhercke, B. & Johnson, R. (2015). Introduction, The EU and the Social Legacy of the Crisis: Piecemeal adjustment or Room for a Paradigm Shift? In Natale, D. & Vanhercke, B. eds.. *Soci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State of Play*, pp. 13-31. Brussels: Europe Trade Union Institute.
- Nieuwenhuis, R. & Maldonado, L. C. (2018). *The Triple Bind of Single-Parent Families: Resources, employment and policies to improve wellbeing*. Bristol: Policy Press.
- Perkins, D., L. Nelms & P. Smyth (2004). Beyond Neo-liberalism: 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Social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3, The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